

中 緬 边 境 之 役

SINO-BURMESE BORDER CAMPAIGN, 1766 -- 1769

黄祖文 著

HUANG ZHU-WEN

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 ⑬

中 緬 边 境 之 役

ISBN 981-04-2466-3



9 789810 424664

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 ④③

中緬边境之役

1766 - 1769

黄祖文 著

SINO-BURMESE BORDER CAMPAIGN, 1766 - 1769

BY

HUANG ZHU-WEN

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书 名: 中緬边境之役,1766 - 1769

作 者: 黄祖文

出 版 者: 新加坡南洋学会

SOUTH SEAS SOCIETY

P. O. Box 709, Singapore 901409

Tel: (65) 4661940 Fax: (65) 4665510

设计制作: 玲子大众传播(新)私人有限公司

LINGZI MASS MEDIA (S) PTE LTD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Tel: 2935677 Fax: 2933575

承 印: 跨世纪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CROSS CENTURY PRESS PTE LTD

出版日期: 2000年5月初版

国际书号: ISBN 981-04-2466-3

定 价: **S\$20.00**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赞 助 者: 郭全强先生

玲子大众传播(新)私人有限公司

目 录

张之毅教授序	4
赵宝煦教授序	5
第一章 中缅边境之役的起因	12
第二章 第一次战役	24
第三章 第二次战役	30
第四章 第三次战役	44
第五章 第四次战役	61
第六章 议和的结局	76
第七章 两军胜负的原因	92
第八章 几点看法	99
跋 谢	104

张之毅教授序

对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緬边界冲突事件应该如何定性,历来是国际学术界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中国学术界则视之为乾隆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个禁区。

緬甸学者吴貌貌丁和英国学者鲁斯硬说中国侵略了緬甸,尊重事实的緬甸学者吴盛民则认为中緬边境之役是由緬方挑起的。中国近年出版的《简明清史》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只字不提。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只叙事件的原委,对其是非曲直未执一词。

黄祖文教授敢于突破禁区,以特大数量包括緬文在内多种文字的可信史料为依据,积极探索,终于澄清了乾隆对緬军深入中国云南境内的侵略行为进行自卫反击的历史真相。

黄祖文教授自卫反击说的主要论据是:一、雍籍牙王朝前三届緬王奉行的向包括暹罗在内的近邻扩张政策是导致中緬边境不断发生冲突并扩大为战争的真正原因;二、对緬方挑起的争端,乾隆严令只要加谨防范,丝毫没有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直到緬王孟驳(1763 - 1776年)当政时,緬军已经深入中国云南土司地区。乾隆迫不得已,才出兵惩戒緬军;三、1769年在緬甸战略要地老官屯,在清军不断围攻下緬甸军心动摇,緬方首先提出议和,乾隆当即批示:“撤军为是”。于是中緬双方代表达成以“永远不犯边境”为主要内容的停战协议,清军随即从緬甸撤回,乾隆既不要求割地,也不干涉緬甸内政。1787年緬王孟云备表向中国请封,清廷封他为緬甸国王。緬甸统治集团从此停止了对云南的扩展,中緬边境此后出现了长期和平。这无疑是乾隆自卫反击政策的胜利。

我认为黄祖文教授的这本著述是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学术突破,是一项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治意义。

1999年12月5日

注: 张之毅,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顾问。

赵宝煦教授序

香港、澳门回归中国，最终结束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亚洲的历史。这是中国人民，也是亚洲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弱小的国家，实不只限于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与经济掠夺几方面，其在文化上造成的深远毒害，也确实不应被忽视。例如有些西方学者发表的有关亚洲的所谓历史著作，在史实方面，往往一知半解，牵强附会；在立论方面，貌似公正，实则似是而非。甚至有时荒谬绝伦，谬种流传，不但使当地人民迷失自己民族的历史真相，而且常常造成有关国家的矛盾纠纷。

关于泰国民族起源以及泰民族到底来自何地的问题，就是一例。有的西方学者，例如法国历史学者雷庇诺等人，就认定泰民族起源于中国北面的阿尔泰山，后来被中国汉族人赶出中原，逐步南迁至云南大理，建大理国。十三世纪，元朝皇帝忽必烈灭大理国，泰民族再次被迫迁徙，最后定居于今天泰国所在地。这种说法，完全是捏造历史。1978年2月，中国《历史研究》学刊上发表了云南历史研究所杜玉亭和陈吕范两位学者的文章《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迁移》。该文根据大量翔实的史料，驳斥了泰族“南迁说”的荒诞，并对中国傣族的分布源流，以及他们与泰国民族的相互关系，作出详尽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这篇论文随即引起当时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重视。他令人把该文译成泰文在泰国发表。他自己并于同年7月1日在曼谷泰文报纸《沙炎叻报》“竞技场”专栏中发表了长篇评论，对杜、陈文章加以肯定。这一段被西方学者歪曲了的历史，至此才真相大白。（请参看中国·北京《历史研究》，及泰国·曼谷《沙炎叻报》1978年6月28日、29日、30日及7月1日）

关于中国清朝乾隆年间中緬边境之役，也是中緬关系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战争双方究竟哪一方是侵略者，哪一方是自卫反击者呢？一般人往往认为，当时中国清朝正值鼎盛时期，

似乎这次战役，是中国侵略了缅甸，而缅甸是自卫反击。缅甸学者作如是说，西方学者也作如是说。特别是英国号称权威的史学家鲁斯所写的《18世纪中国侵略缅甸》一文，影响深远。他引用了一些缅文资料，也应用了部分第二手的中文资料。此后，缅甸学者以及前苏联学者纷纷根据他这篇论文，声言这次战役，是大国侵略小国之役。所谓“三人成虎”，似乎已成定论。而不少中国学者在著书立说涉及此问题时，也视之禁区，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回避态度。

黄祖文教授在本书中，却敢于突破禁区，查阅了大量缅文、中文和西方文字的资料。而他使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极具权威性的，是第一手的资料。他认真查阅了缅文的权威性著作《雍籍牙王朝史》，并根据他所掌握的可信资料对该书有关这次战役的记载，加以详细的核对和校正。他还查阅了中国有关清史的重要史籍《清实录》以及当时随军幕僚的手记。这些重要翔实可靠的史料，都是英国学者鲁斯及其他主要以鲁斯文章为蓝本而草尔著书立说的学者们，所从未曾接触过的。黄祖文教授使用了大量的各种文字的史料，比较分析，去伪存真，而后证据确凿地作出了这次战役是在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缅王孟驳推行扩张政策，占领了暹罗（即今泰国）之后，再向中国云南土司地区推进，从而挑起的中缅边境武装冲突。这样，就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该次战役到底谁是侵略者，谁是自卫反击者的问题。

本来，18世纪中缅边境之役，无论中缅两国谁是入侵者，谁是自卫者，说到底都是两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战争。至于两国人民，都处于被驱使互相攻战的地位。而最终生命、财产受损失的还是两国人民，他们同样是受害者。因此，无论是入侵者，都不应该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今天，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包括研究其他许多类似的涉及国际关系的历史事件），目的只在于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澄清历史的迷雾，粉碎各种历史伪造者的谎言，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使后人能洞察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美好的人类未来服务。因此，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不论研

究对象是中国史,外国史,或者是国际关系史,都不应该设“禁区”。史学家也不应该有所顾虑而回避禁区。历史研究中“禁区”的存在,就是不能坚持历史科学性的典型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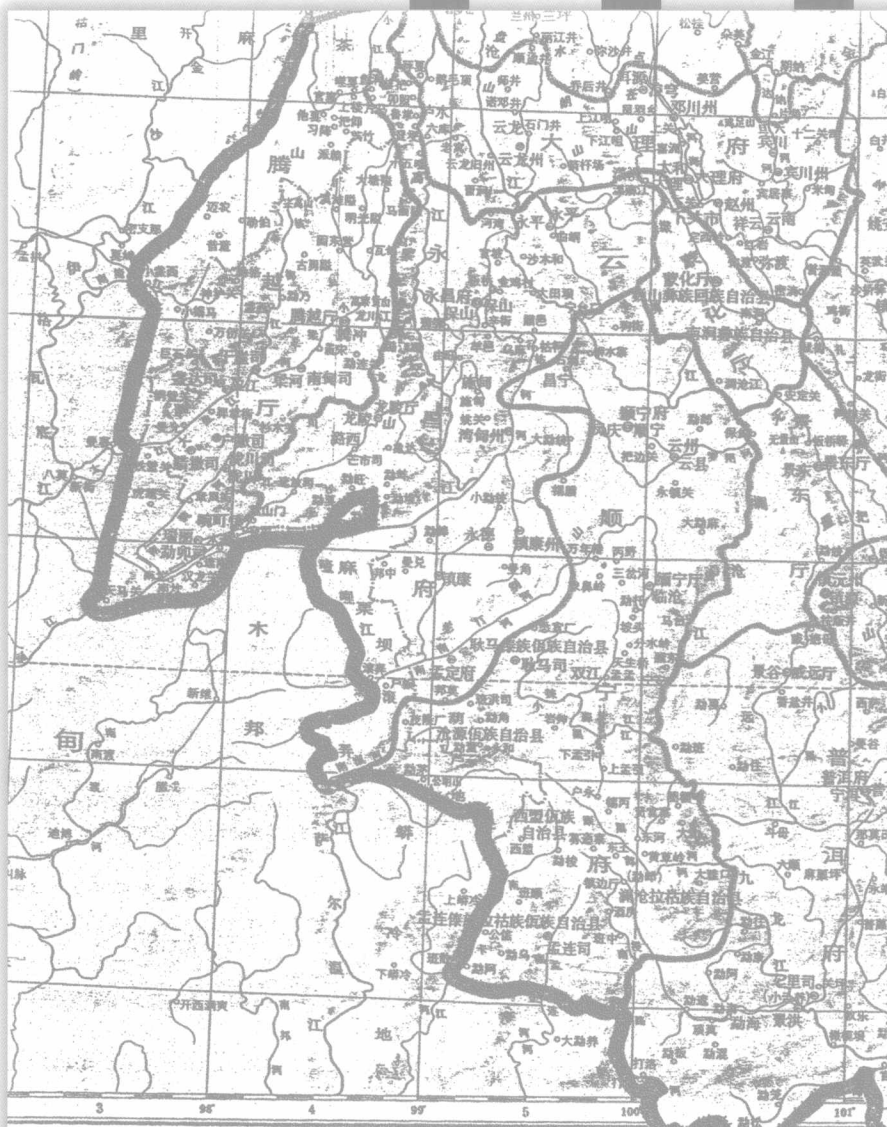
黄祖文教授在本书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一有争议的历史课题,做出自己有说服力的结论。我认为这种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是值得称颂的;这种敢于突破禁区,批驳谬论的理论勇气,是值得学习的。

其实,对于中国历史学者来说,应该做而又有条件做的这一类课题还很多。因为中国可以说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保存有4000多年系统、完整文字历史的国家。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固然值得骄傲,但同时,也使我们的史学家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任的责任,应该在历史研究方面,为人类作出更多贡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早在100年前就曾经说过:“没有任何其它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有连绵不断,有历史家著作的历史。在亚洲,还有其它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是没有史籍。”(黑格尔:《历史哲学》,伦敦英译本,克伦耐尔出版社,第116页,1900年版;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中译本,王造时译,三联书店,第161页,1956年版)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丰富历史典籍中,不仅详细记载着中国本身的历史,而且也详细记载着各个时期中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的历史。众所周知,在印度早已无法查找的印度古代史料,往往是从早年传到中国仍然保存完好的中文译文中重新发现的。我在前面引述的泰国克利·巴莫先生的那篇评论文中就明确说道:研究泰国历史问题,“看来要寻求充分的依据,还得从中国去找。因为中国人善于记载他们所了解的其他民族的各种事情的细节和情况。”(泰国·曼谷《沙炎叻报》1978年7月1日)

中国的史学家确实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希望将有更多的如本书一样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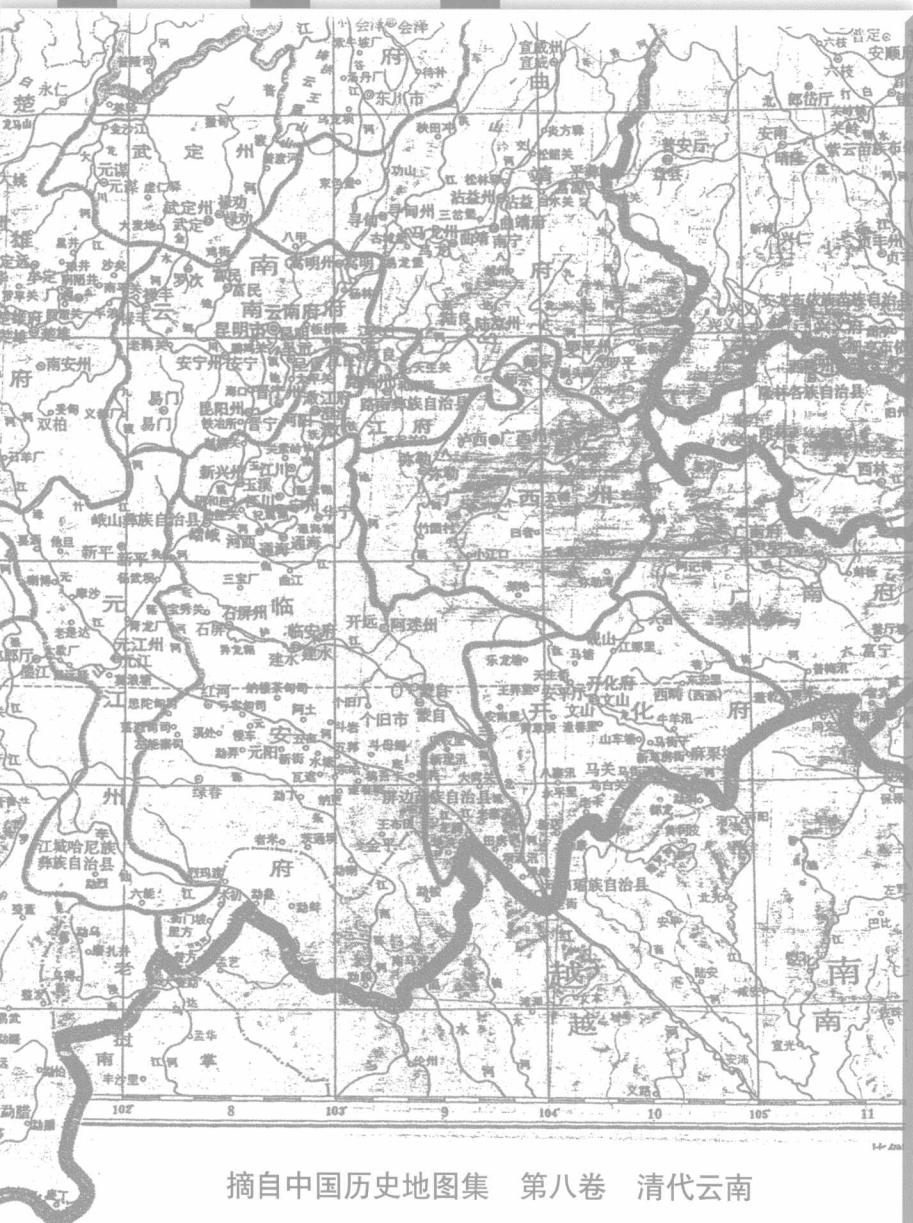
2000年1月31日

注:赵宝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注：地图根据原图效果

南 地 图



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卷 清代云南

中緬邊境之役

中国和緬甸有着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悠久历史。

在中緬关系史的研究中,我们多年来比较注意上述主流。但同时,对历史长河中客观存在的中国与緬甸极少的边境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则研究得不够。我认为这种不愉快的事件,并不能损害中国人民和緬甸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因为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与緬甸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中国人民和緬甸人民则处于被驱使从事战争的地位,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受到巨大的损失。中国人民和緬甸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始终是互相同情的。

清代乾隆年间中緬边境之役就是这种极其不愉快的事件。我们应该根据中緬双方的史料和学者的论著,对它进行研究和分析,真实地说明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从中吸取教训,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这对于增进中緬两国的传统友谊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第一章 中緬邊境之役的起因

十八世纪中叶，缅甸的雍籍牙（Aungzeya, 1752-1760年）打败了孟族统治者，建立自己的王朝以后，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得缅甸由一个分崩离析、衰弱不堪的国家变成了雄据东南亚的封建强国。

然而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建立过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以首都为中心的三环形地方行政组织进行统治。这三环形指的是：（一）、首都及其周围地区。（二）、历代传统管辖的范围更大的一些地区。（三）、土司头人控制的边远地区，包括藩属地区。对于这种三环形的地方行政组织，越是接近首都，缅王对它的控制就越有效；越是边远地区，缅王对它的控制也就越薄弱。

研究导致中緬邊境之役的起因，首先应该了解缅王雍籍牙父子的对外政策。

缅甸学者貌丁昂曾经写道：“雍籍牙希望承认他为蒲甘（指蒲甘王朝——引者）的阿奴律陀（Anawratha 1044-1077）和东吁（指东吁王朝——引者）的莽应龙（Bayinnaung 1551-1581）的继承者以及第三缅甸帝国的建立者。”[1]十分明显，他是要恢复缅王阿奴律陀和缅王莽应龙统治时期的版图和那时的强盛[2]。缅甸学者玛妙

盛也认为：“这个生气勃勃的新王朝不用说，渴望扩张。”
[3]

緬王雍籍牙既然要继承緬王阿奴律陀和緬王莽应龙的事业，他的对外政策主要内容必然是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其矛头先后指向緬甸西北部的曼尼坡(Manipur, 或译作曼尼普尔)，东部的暹罗和东北部的中国云南边境土司地区。緬王雍籍牙死后，他的长子莽纪觉(Naungdawgyi, 1760—1763年)和次子孟驳(Hsinbyushin, 1763—1776年)相继即位，都遵循他的对外政策，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就必然要与中国发生边界争端和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简要事实如下：

1755年緬王雍籍牙曾经派兵远征曼尼坡。1758年他又亲征曼尼坡。

1759年雍籍牙还亲自出征暹罗。緬军包围了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只是雍籍牙染上了疾疫，他才下令撤兵回国。由于他的病势沉重，1760年5月他到达緬甸直通(Thaton)的米磷(Bilin)时，便病死了。

然而云南境内某些土司由于过去向緬甸东吁王朝“亦稍致馈遗(即赠送财物——引者，下同)，谓之花马礼，由来久矣。暨緬人内讧，礼遂废。雍籍牙父子欲复其旧，诸土司弗应。”[4]可是因为上述出征暹罗的结果，緬王雍籍牙欲恢复花马礼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此外，根据中国史籍记载：“雍籍牙立，令头目播定蚌等以兵胁诸夷。于是诸夷震慑。东至整欠(现在緬甸东北部的景栋以东，即南垒河北岸的景坎城)、景迈(即清

迈，现在泰国北部），孟艮（现在缅甸东北部的景栋）、猛勇（即孟勇，在整欠的西南），西北至猛拱及木邦（现在的兴威、腊戍一带）、蛮暮（即八莫），均为缅属。”[5]这实际上已经进逼中国边境云南土司地区。

上任不久的云南巡抚刘藻曾经这样向乾隆皇帝（Emperor Chien-lung）报告云南边境的情况及其对策：“至开化、普洱、永昌等府皆与交趾（即越南）、南掌（即老挝）、缅甸为邻。年来外夷内讧、多有自相攻击之事。然距内地甚远，不足致问。惟在严飭文武员弁，于沿边要隘，加谨防范，则边民安堵，中外肃清。”[6]乾隆皇帝完全同意他的意见，1758年初[7]批示：“此见，果认得真，行得力，何愁不治。”[8]由此可以看出：云南地方当局和乾隆皇帝都希望边境太平，居民安定，只是加谨防范，丝毫没有打算发动战争。

缅王莽纪觉从1760年开始，只当政了短暂的三年半。在这期间，他忙于镇压内部王位的争夺者，而主要是平定雍籍牙用兵未能使一些土司真正臣服，以致这些土司又脱离了他的控制。于是他“构兵如故”[9]，“兼并诸土司，景线（在猛勇西南，滨澜沧江西岸，现属暹罗），整卖（即景迈）、孟艮、整欠皆被胁从。”[10]由于这些土司与中国云南境内的孟连、孟定、耿马和西双版纳（即十三版纳）那些土司地区相距极近，对缅王莽纪觉要恢复那些土司废除已久的花马礼提供了便利。于是缅王莽纪觉“先遣（孟连土司）刁派先之兄刁派新自阿瓦还至孟连，征索币货。”[11]又“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来索（花马礼），先

闌入（即擅入）我（指云南——引者）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為向导，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即攔住）之于滾弄江，擊斬普拉布。”[12]其頭目被擊斬，剩下的緬兵也就逃走了。後來緬王莽紀覺還宣稱：“普洱十三版納（即西双版纳）原屬緬甸，索其貢獻（即花馬禮），（派緬軍）至打洛隘口。猛遮御之，遂犯猛籠。猛籠不能御，土弁刀乃占等被害。普洱鎮（總兵）劉德成赴九龍江（即普洱境內的瀾滄江）堵御。總督吳達善調元江土練未至。次年緬兵始退，時分兵至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莽紀覺死，（緬兵）乃退，由打洛出境。”[13]

由此可見，緬王莽紀覺當政時，中緬兩國不僅產生了邊界爭端，而且緬軍已經深入中國雲南省的土司地區，兩國已經發生了邊境武裝衝突。

緬王孟駁執政時期是緬甸歷史上國勢最強盛的時候。緬甸學者貌都稱贊緬王孟駁“才智過人，涉世不久，但閱歷頗深，特別是在軍事上更是足智多謀。”[14]他力圖完成他的父親緬王雍籍牙未竟的事業，即征服暹羅和曼尼坡，要求中國雲南省境內一些土司恢復花馬禮，並赴阿瓦會盟。

孟駁曾經是緬王雍籍牙遠征暹羅的先鋒和主要將領，自然他不甘心於那次沒有攻下暹羅的首都阿瑜陀耶，失利而還。所以他早就下定了決心，要征服暹羅。他吸取了已往的經驗教訓，認為不能像自己的父親雍籍牙過去那樣作速決戰，而要採取穩扎穩打的戰略，準備進行長期的戰爭，因而打算由南北兩路先占領暹羅的外圍地區作為